

超越现代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批判*

崔廷强 张子扬

内容提要 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国际交往的组织形态和基本主体,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困境始终是西方学界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伴随着民族建构原生性的削弱与政治性的加强,民族国家理论现代性趋向促进了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的生成觉醒。特别在当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国家认同与族群发展的内在张力成为西方民族国家建构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民族国家在建构进程中需要将民族认同有效转化为国家认同,就必须明确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演变历程,协调处理文化多元化与民族一体化的辩证关系。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特质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多维超越,从认知、路径、价值三个维度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进行批判反思,为消除民族国家不同族群文化的对立冲突打开了新空间,为调和族群与国家的认同张力提供了历史启示,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范式和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新思路。

关键词 民族国家 现代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

引言

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始终是政治学、民族学研究的热门焦点,也是当今世界西方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难题,因此,基于现代性视角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文化多元化给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构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涉及国家内部的繁荣稳定,还关系到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未来走向。民族国家作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不仅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国际交往合作的基本组织形式,但由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各自国情的差异,民族发展各有其独特的历史,促使文化多元的现代性趋向和民族一体的现代性建构产生激化对抗,也造成了国家层面的认同建构与民族层面的族群发展形成内在张力。由此,为了超越现代性给西方民族国家带来的负面效应,基于现代性视角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进行批判,宣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

一、民族国家理论的历史溯源:民族与现代性的概念考辨

民族、族群及其演化递进始终贯穿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民族”概念在今天的人类话语体系中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涵盖了个体、集体、国家等多维领域,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紧密相关,直至关乎人类文明形态的未来走向和长远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现代主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1&ZD038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权国家要持续完善国家建构首先要清晰界定“民族”概念问题,但由于民族概念自身的复杂性,民族概念在考究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民族概念的流变呈现出原生性不断削弱,政治性不断加强的态势。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认同的生成,使学界对民族概念的认知界定颇有争议。“民族”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现代性赋予民族的现代特征是什么?伴随着现代性不断加强的时代趋势,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人类文明形态不断革新,亟须不同民族国家在“民族”概念上形成普遍的共识,这就需要梳理民族国家理论的历史渊源来追溯民族概念的本质特征加以明晰和考究。

(一) 民族概念的现代性趋向:原生性的削弱与政治性的加强

自人类诞生以来,“要给‘没有历史的民族’找一个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中寻找),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民族。”^①历史语境下,“民族是一个有机的、无缝的和超越个体成员的整体,并将个体成员从其出生开始就打上去不掉的民族烙印”^②。因此,对传统民族概念可以界定为: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是一个始终贯穿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人类共同体。其中同宗意识是形成传统民族聚合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民族强调共同的祖先、血缘来加强个体之间的民族观念,以共同的语言、文化、地域等客观要素来联结群体之间的集体纽带。原生主义代表人物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正是因为民族群体有生以来就伴随着血缘、文化、宗教等既定特质,民族就先于民族主义产生,最终在既定特质的多维联系下结合成统一国家,^③由此看来,民族先于国家而产生。

在西方民族的语境下,民族概念的阐释来源于拉丁语“to be born”的注解,意指出生、出生地。即出生在共同地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风俗的特定群体。罗马对民族的注解表示,“Natio”具有“创造”“出生地”的含义,亦是古代“自然女神”的称谓。“Nation”一词与“gens”和“populus”词语等同,意指政治思想尚未启蒙、文化意识尚未开化的原生性族群群体。将以上二者古典语言的解析对比可以看出,民族实际上是一种以血缘联结、以地域栖居、以语言交流、以文化传承的具有共同性的自然共同体。此外,鉴于民族与族群的概念混淆使用情况,有必要具体探析族群概念的核心范畴。相对于民族的概念阐释,族群通常用“ethnic group”或“ethnie”来进行内涵表达,这里的“ethnic group”(ethnie)意为“族群的”或“人类集团”,更偏向于从生物性特征去表达,意指由习惯风俗、行为特征、语言文化等共性因素结合形成的人类集团,但这种人类集团还不能指代民族(nation),它可能还处于尚未形成民族的原初阶段,也可能正处于质量互变的转化阶段,也可能处于永远无法形成民族的集团群体。

通过对族群与民族的比较分析,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在于族群概念并不追求政治上的能动性,强调的是文化属性,因而适用范围相对广泛。而民族是具有政治性的被国家主权赋予法律地位的历史产物,强调的是政治属性。此外,在民族国家的历史语境中,鉴于族群—民族—国族的发展谱系,还需要明辨国族的概念内涵以及界定族群、民族、国族三者的使用层次问题。国族(nation)一词来源于西方,在1993年出版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对国族概念阐释为在主权国家建立的大前提下,各类不同族群通过共同的血缘纽带、语言风俗和历史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容纳各族群体的统一民族。总之,在民族国家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族群、民族、国家等概念始终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牵绊

① 列宁:《编辑部对韦帖兰的〈民族问题和拉脱维亚的无产阶级〉一文的意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308页。

② [美]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③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pp. 105 – 157.

联系,三者共同构成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组成部分。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展,人类文明都是围绕“国家”建构的主题不断延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相关论述:“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①这深刻揭示了原生性的部落组织向国家政权过渡的框架形式,民族与国家的辩证关系始终居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位置。基于当前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只有清晰界定“现代性”的核心内涵,才能对民族的现代性特征进行历史溯源,从而发现民族概念背后的现代性趋向。现代性肇始于西方,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实践映照与文化景象,现代性成为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的逻辑阐释,“现代”揭示了传统与新兴的断裂关系,是基于人类社会发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特殊称谓,内嵌于一种时间断裂的意识判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现代性阐释为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构筑打造的现代社会产物。它涵盖了人对世界关系的态度(世界观)、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制度)与现代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制度)的综合范围。“现代性”作为阐释当下人类文明进入现代社会的时代象征,映射到民族国家建构中就呈现出一种民族与国家有机融合的态势。作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典型国家形式,民族国家在建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性的影响,致使民族与国家相互嵌入并共同塑造起了民族国家实体,民族具有了国家的内涵和机理,国家具有了民族的特征与属性。^②民族属性与民族特征深深融入民族国家的系统建构之中,同时在价值理念、制度方针以及国家治理方面深刻体现,造就了民族日益成为国家形态下的底层支柱。此外,现代民族打破了传统民族因共同血缘、共同地域、语言风俗等现实标准的束缚,诉诸获取更广泛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归属感以构筑民族共同体,尤其是在对抗君主专制的封建斗争进程中,现代民族开始意识到自身含有同质性的共同体特质,这就驱使现代民族产生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对民族国家的效忠认同与民族身份的最终确证是现代民族政治性的突出特征,民族国家的建构促进了民族现代性的生成发展,同时也通过维护民族利益以确证其合法性赋予了现代民族蕴含国民性的现代特质。由此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要是指以国家形态作为民族存在发展的政治共同体,现代民族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被国家视为自身政治权利的唯一来源。即现代民族是以建构民族国家为目标,以拥有民族权利为核心的政治性群体。由此看来,“‘民族’这个词的古老含义主要被想象为种族单位,但是新近的用法更强调‘政治统一体和政治独立性的观念’”^③。政治性的加强与原生性的削弱成为现代民族与传统民族的分水岭。

总之,民族概念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不仅是在文化层面上自然生成的概念,也是在现代政治氛围下不断异化、演变的概念。对于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的概念界定,西方学界做出相关论述:“当一定的族群或民族扩大为一个稳定的交往共同体时,这个共同体对于外来的族群,则可能称之为民族。”^④“民族是一种充分宣称有自己国家情感的共同体;由此,民族是一种通常趋向于建立自己国家的共同体。”^⑤我们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民族的第一层含义是将是否必然建立国家作为界定区别具有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共同地域的原生性传统民族;第二层含义是将是否对国家建构起到核心作用作为划定区分具有可塑性、场域性、自觉性的政治性现代民族。因此,在现代性视野下对民族概念进行传统与现代的深化剖析,对进一步把握西方民族国家内部的现代性特征具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② 周平:《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载《江汉论坛》,2023年第5期。

③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4 - 18.

④ [法]厄内斯特·勒南著,袁剑译:《民族是什么?》,载《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6年第1期。

⑤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26页。

重要意义。

(二) 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特征: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生成

民族的这一现代性特征主要源自西方的人为主观建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建构历史也是形成现代民族的建构历史,民族国家叙事话语体系下的“民族共同体”其构成要素主要包含统一的政治法律体系、共有的经济管理制度、共同的意识形态、平等的公民权利,现代民族被政治性所赋予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即国族(nation)成为国家的形象表征,赋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具有政治性、可塑性和自发性特点,体现了民族概念流变过程中人为建构的现代性特征。要想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就必须明晰界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核心内涵。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Ethnic group”和“Nationality”都可以指代处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类群体,“Ethnic group”是希腊语“Ethnos”的派生词,主要是指代居于国家内部的具有异质性外来群体。“Na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语,主要是强调居于国家传统区域的本土性群体,而“Nation”相较于外来人,意指通过国家建构形式将本土性各类群体整合统一起来的人民概念。为了避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在民族、国家二者概念层面的争议,因此,民族认同也有“the identity concerning of nationality”的提法。据此,鉴于英文词源的区别,民族认同(the identity concerning of nationality)是指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以族类共同体的民族内部成员为主体,基于族群文化、民族语言、历史习俗的联结纽带,通过经济合作、文化交往等生产生活形式,从自由自在的无意识转化为认同归属本民族的心理过程。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国家主权建立以来以国家政府的中央权力为行为主体,通过法律制度、文化教育等多维度影响形成对国家公民的普遍约束力,以政治共同体的形式获得国家公民的集体认同过程。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构筑国家主权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近代的历史语境下,国家统治者为了强化自身的权威,往往采取领土占领、资源掠夺的战争形式,意图削弱封建贵族、宗教组织对君主权威的制约力量。通过标榜君主权力为民族主权,在提升君主权威的同时达到对民族国民的规训,将国民的忠诚从教会、君主等权威领域转化为国家力量。在君主权力转移为民族主权的过程中,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众多新教改革家通过将《圣经》进行民族语言的多种转译,在各个民族地区进行传教。在德国,路德新教的建立无疑是对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发起了新的冲击和挑战,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废除了持续近百年的“教随国定”原则,逐渐摆脱了罗马教廷对德国国民的精神束缚,有力推进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萌芽,最终在1848年爆发了民主革命运动。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统治者在巩固国家权力的同时,利用宗教传教的方式来团结国家内部的国民群体,通过传教将公众群体的身份由臣民上升为国民的转变,从而在中央权力与民族主权之间架构一条沟通的桥梁,进而逐渐塑造起国民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促使形成了以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国家。

国家层面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的真正建构发源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奉行自由主义的法国思想家主张将贵族作为第二等级并使第二等级成了国家公民的象征,法兰西国家成为普法制度体系下以中央立法机构为核心的社会集合体,将民族身份、人民主权、国家主权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此外,法国大革命中萌生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思想主张也与法兰西国家的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政治与文化的和谐统一。伴随着1792年《马赛曲》的谱写和三色旗的创制,其文化内涵和政治色彩大大激发了法兰西人民的革命热情,积极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成果,这也深刻体现了民族与国家的共生互补关系。正如安德森指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启蒙运动相照应,冲破了封建神权与传统血缘的束

缚,促使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共同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①由此,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建立民族国家的典型案例,而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精神也成了法国的民族象征。

总之,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中,国家主权下的“人民”与身份认同下的“民族”共同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基础,民族国家实质上就是以民族意识为基础构筑民族认同的政治联合体。通过民族的政治合法性赋予“我们”正当权利,本民族的“我们”不仅在国家主权作为主权所有者的“人民”,而且愿意为所在民族国家做出必要贡献并主观愿意保卫本民族的“朋友亲属”^②。不仅如此,在民族国家的制度设置下,根据特定的民族认同来划分界定领土边界,并利用国家政权对特定地区人民进行有效的事务管理。由于国家内部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认同的生成在国家建构进程中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合力,民族国家也形成了牢固有力的忠诚堡垒。在当今全球化的现代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以民族主权与国家主权高度融合为特点,将国家表征与民族认同进行有效衔接,最终以民族为核心构建起的国家组织形态成为当今世界舞台的参与主体。

二、民族国家理论的发生逻辑: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转向

民族国家建构从广义上看,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都是构成民族国家的重要环节。从狭义上看,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本质就是聚焦于民族建构进程中打造培育统一团结的民族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感。就是奥斯特鲁德(Ostrude)认为民族建构“是一个建筑的比喻,比喻国家内部引发的整合国家的过程,也是把居民联系、结合为民族同胞的过程”^③。因此,民族国家建构实际上就是国家根据领土区域并结合民族特性,通过政治架构、立法规则等多项改革措施实现政治-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打破了以往对外封闭和隔绝的状态,伴随着现代性的影响,民族国家在建构进程中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文化多样性问题成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首要解决的难题。“文化差异政治”对以往传统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提出挑战,日益对民族国家的稳定统一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族群与民族、族群与国家、民族与国家三者的关系由于认同理念的具体性差异,导致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在解决国家认同与族群发展的现代性困境时出现举步维艰的局面。因此,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如何面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转向,如何化解文化差异的族群冲突,成为民族国家理论研究的热点议题。

(一) 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本质:民族一体与文化多元

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背景来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建构路径就是在民族建构中正视文化多元化发展,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明辨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的逻辑关系。“民族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民族与国家不是基本等同的概念,但二者的目标趋于统一”^④。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的影响,由单一种族或族群形成的“单一族群国家”早已不复存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构成开始呈现全球化态势,各个国家内部都会有文化各异的公民。诸如美国、加拿大等多民族国家,乃至文化与族群同质性较高的伊斯兰国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产生了新的民族建构问题。不同族群之间认同内容、价值体系、文化内核的差异,必然会随着现代化进程对民族国家造成文化冲击。纵观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民族共处(Accommodation)、民族同化(Assimilation)、民族排外(Exclusion)三种策略导向。民族共处政策在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尤为盛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②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③ [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④ A. D. Smith, *Myth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5.

行,南非、巴西等国在民族建构进程中采用宽松包容的政治手段调和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其国内各民族各自独立生活、互不干涉,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民族同化政策在美国、东欧等国家普遍存在,通过文化传播、政治宣传等强制措施将外来人口隐性转化为本国民族。民族排外政策在中东、中亚地区长期实行,阿富汗、土耳其等国通过军事武装等暴力手段驱逐排斥其他民族。实际上,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政策中,民族共处才是构筑国家内部民族团结的坚实力量 and 最优选择,然而由于西方国家自身制度的缺陷,中央政权将制定政策的重心主要聚焦于主流族群的利益权利,导致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往往出现“本末倒置”的不对等局面。不仅如此,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现代国家实践中,加拿大的拼合主义植根于不同民族各自社会文化所形成的社会形态,以调和妥协的方式回避冲突,使得加拿大文化成为所谓的“新世界的旧人”的文化。但加拿大奉行保守主义的亲英归化政策,使得加拿大社会产生了和美国文化相区别的文化特点和独特的文化归属感,造成了印第安人、法籍加拿大人和英籍加拿大人之间的怀疑、不和,甚至是冲突的局面。由此,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共处由于采用放任宽松的态度致使不同民族之间处于封闭孤立的生活状态,民族同化和民族排斥由于地理因素、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等差异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and 非正义性。所以,如何客观合理的认识民族一体与文化多元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中的辩证逻辑,成了西方国家能否顺利解决现代性困境的核心关键。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本质就是要权衡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关系平衡,把文化各异的族群调动起来促进国家整合进程,利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种纽带来形成国家认同,实现民族国家的民族一体化。

从政治一体化的建构目标来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构建路径就是在民族建构中推进民族一体化进程,在国家建构中保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民族一体化方面,伴随着现代性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现代国家的形成具有两种鲜明的特征:一种是民族国家,即国家政权通过吸收国家公民“公意”来打造国家机器,以获取人民大众身份认同的同时实现国家资源整合;一种是民主国家,即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大众,居住在国家领土区域内的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可见,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制度、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成了不同民族国家强化国家认同的必然抉择,只有这样民族国家才能实现全体成员对国家政权的管控,催生民族群体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归属。在权力合法化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质就是在维护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同时,调和不同族群的族群冲突,促使国内不同族群联结为同一民族成员,以获得族群对国家的认同,保证国家认同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多元族群内部的至上性。可见,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民族国家必须正视民族群体的发展性变化,根据现实境况来适时调整民族政策来避免族群矛盾冲突的发生。

总之,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只有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制定符合民族发展境况的政策措施,才能满足不同族群的利益诉求,正确处理少数族群与主流民族、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的关系,坚决杜绝国家分裂的现象发生,有效推进国家整合与民族一体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现实背景、发展境况、政治制度以及当前国内族群状况等都略有差异,所以国家认同与族群发展的内在张力将持续存在。

(二) 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危机:国家认同与族群发展的内在张力

要讨论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危机,就必须清晰界定多元文化背景下国家认同叙事的内在逻辑张力。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来看,伴随着全球化世界体系的现代性影响,全球人口的迁移流向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态势加深了世界民族的融合趋势。在此过程中,基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族群发展与构建强力坚固的国家认同也日益呈现冲突碰撞的局面。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论述道:“今天的国家在可以选用的民族建构工具上受到了更多

的限制,少数民族拥有更有力的内部资源和外部盟友来捍卫自己”。^①首先,从民族主体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不同民族成员的利益诉求日渐多样化,致使国家政府面对纷繁复杂的民族利益分配时常出现分配不均衡不到位的情况,长此以往的不当操作会助长民族分裂主义的气焰,导致民族成员的心理认同产生疏离感,进而动摇国家认同基础,对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形成隐性威胁。其次,从国家主体的角度来看,国家在资源调配和政策制定中常常以带有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强迫不同民族放弃自身独特个性来达到削弱少数民族群体内部民族认同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因其少数民族的心理抵触,容易引发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的族际冲突。最后,从现代性的视野来看,现代性的影响致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认同对象、认同基础、维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冲击,伴随着多元文化的隐性灌输和传统文化的解构消逝,针对仍居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采取弱民族认同与强国家认同的政策导向强化了族群发展与国家建构的内在对抗。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现代化和民主化致使民族国家不得不根据所在领土区域的民族发展状况,采取符合其公民“公意”的政策措施来构筑公民身份,以获得国家公民的忠诚感和归属感,实现国家对社会、人民的科学管理与有效统治。虽然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是围绕构建国家公民的“公民身份”来强化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但是西方国家内部的制度性缺陷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冲击,国家公民的身份认同开始异化转变为阶级群体的身份认同。“公民身份”由最初旨在调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矛盾冲突、强调人人平等观念的政治口号,开始异变为加强国家政权权威、集中资源整合的政治工具,这无疑在无形之中加深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桎梏。由此看来,现代性强化了作为“权力填充器”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在社会不同领域都发挥着国家强大的控制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一体化建构的进程;与此同时,现代性也激化了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类群体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认同的生成,各类少数民族向国家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这也成为一种阻碍民族国家建构的力量。

早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立之初,经过漫长的理论衍化与体系拓展,最终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古典民族主义理论就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想目标,它倡导民族与国家互为一体的政治主张,认为民族是自然生成的社会产物,国家是人为建构的政治实体,只有将民族自决观念与个人自由权力紧密结合,通过政治实体的形式将二者固定下来,才能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和谐共生。其核心主题是: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古典民族主义理论的叙事逻辑实质上就是通过保留语言文化的同质性特点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集合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在融合过程中积极推进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的统一,最终形成自我族群统治的独立国家。但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影响,以现代主义学派著称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等学者开始针对古典民族主义理论所暴露的体系缺陷进行激烈的抨击。

古典民族主义理论自产生以来其理论内核就来源于浪漫主义时代的近代西欧,使它理论体系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倾向,具有极强的非现实性和非合理性。从边界界定来看,它忽视了族群群体的变化发展,以孤立静止的视角采取以国家边界划定民族边界的方法,造成了传统民族因地域、血缘等固定身份联结的冲突,往往导致民族分离主义局面的产生。从国民性质来看,它片面看待了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国民群体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复合群体,忽视了国家成员的多元构成性质。致使民族国家建构往往以占主流优势的族群视为单一族群来开展国家活动,造成了少数民族的不平等局面。从国家整合来看,它将语言文化各异的族群分类简单化,忽视了国民成员内部构成的复杂性,造成了跨界人民的历史存在也催生了不同族群发生族际冲突的可能性。从认知理念来看,古

^① [加]威尔·金里卡著,刘曙辉译:《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典民族主义理论将民族国家建构的构建目标和实现途径互为颠倒,将“国民-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最终目的,把调整缓和民族利益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工具,这就促使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民族复国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泛民族主义等多种反国家反社会思潮的出现。总的来说,古典民族主义理论以民族国家的理想形态为起点,却伴随着现代性的影响和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导致历史终结,从现代化视角来看,多民族国家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事实,这也恰巧指明了西方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已经与时代脱节。

在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叙事语境下,“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型旨在打造“一族一国”的理想形态,但放眼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体系下,由多种民族群体复合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仍占绝大多数。西方民族国家基于现代性的影响,试图通过构筑一系列完整配套的制度性机制来维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稳定关系,但对于二者而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共同存在于政治共同体内部的身份认同概念,在单一型民族国家与复合型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也互不相同。单一型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一致的同—性。但在民族多元的现代语境下,多民族的国家认同是基于自身民族权益针对国家权力配置、文化意识、经济实力等多维度的认同归属,相较于“一族一国”的政治共同体,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更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总体来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与少数民族自我发展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民族国家建构始终以国家内部培育出统一的民族群体,实现民族一体化为最高目标;而不同族群却是以保存自身的族群文化为目标,遵循传统族群的价值模式与行为准则来谋求长远发展。族群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主要是由统一的文化内涵、稳固的文化纽带构筑而成的,族群之间的文化联系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所以即使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作为政治共同体产生的民族却仍无法驾驭族群这一文化共同体,族群作为一种特定群体仍将长期存在,而且会对民族共同体的和谐稳定起到极大的辐射作用。

总之,在现代性影响下产生的国家认同与族群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建构普遍面临的现代性危机。所以,民族国家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来缓和民族矛盾冲突,而如何调整权衡民族一体化与族群多元化的动态平衡关系,就成了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但这的确是一个陷入两难的棘手难题,一方面,倘若族群只聚焦于自我文化的盲目崇拜,把自己族群的身份认同放在首要位置,那么势必会阻碍民族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如果民族国家漠视少数民族的特殊性,采取武装暴力等强制性措施来强行要求国家内部的民族成员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那势必会触及国家政权的权力合法性的底线。面对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如何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实行民族族群多元文化的共荣共存方针来建构国家认同,这就需要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形态中寻求一种全新的民族国家建构方案。

三、民族国家理论的批判反思: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

在讨论如何超越现代性对西方民族国家进行批判时,我们必须依据当下现实境况明确两个现实境况:第一,在国家性质方面,民族国家依然是现代世界体系下普遍参与国际交往合作的组织形态;第二,在国际形势方面,多元文化的发展态势是现代民族国家普遍面对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看出,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变革,在现代性影响下的西方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如何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呼唤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出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①习近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7页。

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开拓创新,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最有力的回应。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革新,是深度契合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践路径,是厚积革新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范式。在认知层面上,深刻批判了民族一体与文化多元的矛盾冲突问题,倡导求同存异的文明交往,实现了对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身份建构的认知超越;在路径层面上,深刻批判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冲突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的文明理念,实现了对现代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建构的路径超越;在价值层面上,深刻批判了文明优越与文明隔阂问题,秉承包容开放的文化互鉴,实现了对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和谐建构的价值超越。

(一) 认知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有了清晰的论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在这里,马克思以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作为参考坐标,横向勾勒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史转向世界史的未来图景,揭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由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共荣的历史规律。这就要求我们清晰把握文化多元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现实向度,才能更积极推动政治一体化的建设方向。与此同时,政治一体化是文化多元化的制度保障,民族国家的政治一体化切实保障了族群文化的多元发展,有效抵御了外来文化的侵蚀,避免了文化冲突导致民族国家分崩离析局面的产生。这就启示我们必须重视政治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辩证关系,尊重不同族群文化的多样性,消除文化冲突对政治一体造成的威胁。因此,在处理政治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问题时,要合理把握好“求同”与“存异”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政治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现代性冲突。正是为了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调和现代性所带来的民族一体与文化多元的矛盾,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包容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纵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群体意识的觉醒都会自发地产生一种排异性,即国家共同体范围内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划清界限。这种排异性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感情,造成了整体与部分、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给解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人类文明新形态正面应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困境,积极回应国家内部矛盾性的存在,促使民族团结与国家建构在不触及根本冲突的前提下进行有效调和,形成有效的回应机制,将民族国家的冲突与疏离以契约承诺、情感共鸣为纽带容纳在国家共同体之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以包容开放的方式将不同民族国家联结起来,促使多元自觉的民族成员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身份之间经过对立、争论、交流、和解达成包容性共识。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内生性与自主性的辩证统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框架结构深刻体现了“一体”与“多元”的辩证逻辑。“多元”反映了不同民族国家因历史、地理、文化等差异性因素所赋予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多样性与所在地区的治理方式的独特性,“一体”揭示了民族国家内部政策法规等制度性体系框架下公民身份的统一性。“多元”是“一体”的现实构成和动力源泉,为“一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1页。

体”最高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现实支撑和基础保障,“一体”是“多元”的价值旨归和目标导向,为“多元”共存共荣共建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持,二者共同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内涵的内生性、自主性、整体性,持续推动全球视野下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多民族间共同繁荣、民主自由、彼此成就的有机共生关系。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先进性与继承性辩证统一。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论述道:“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是许许多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①人类文明新形态守正创新地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来源。世界历史不是黑格尔意义上抽象的“世界精神”,^②而是要立足现实诉求于人类文明形态来开辟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世界历史是以国家和民族作为组织形态的有机整体,传统民族国家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历程,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是在通向“普遍文明”的未来道路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层面构筑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一方面兼顾了不同民族国家的特殊性文明,另一方面又以“普遍文明”作为不同民族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因而这一能够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兼容民族国家特殊文明的文明形态,便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行进平台。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深刻批判了现代民族国家无法充分解决文化多元给政治一体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也是基于文化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秉承着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理论宗旨,照应着中国始终把各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世界谋大同的现实关照。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消除不同民族国家政治形态各异、文化多元冲突提供了新的视野空间,因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特点,实现了对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认知超越。

(二) 路径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度契合世界民族历史发展规律

通过对民族国家历史脉络的梳理,传统民族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转化始终围绕身份认同为核心产生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矛盾冲突。但二者之间的冲突并非无法化解。西方传统民族国家理论都是围绕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建构,对待族群文化问题始终采取放任自流的中立态度。伴随着现代民主的发展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传统的民族国家理论无法适应现代性的发展,不仅没有减弱不同族群的文化认同,反而不断强化族群身份的建立,最终不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从西方民族建构的历史进程来看,西方民族国家在面对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产生矛盾冲突时主要采取两种途径来调和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矛盾:一种是通过种族歧视、文化同化等强制性措施,以族类群体为开展目标,强化主流族群的国家认同,漠视弱势族群的利益诉求,被历史确证是反人道、反社会的;另一种是通过立法法规、政策照顾等多种形式,赋予弱势族群法律权利,从而促进不同族群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程度,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短期的。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中,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成为众多西方民族国家解决多元民族张力的最优选择。多元文化主义以“差异政治”“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为核心概念构建民族平等文化观,意图缓和多元民族情境下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多民族国家依旧无法摆脱多民族张力的现代困境,因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曲解了民族与族群的真实内涵。在西方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境遇中,多元文化主义针对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群体实行概念混淆的方式,利用族群概念与民族概念的边界模糊倾向,把少数民族群体视作为族群单位,以族群代替民族的概念操作来实现以文化属性替换政治属性的身份转换,从而将多民族的社会缩小为多元文化的社会。因此,从根本上说,文化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②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多元的现实背景与政治一体的建构目标无法形成有效的调和统一,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多民族成员因民族身份差异、文化习俗差异、宗教信仰差异等多元差异构成了多元文化主义无法跨越的现实障碍。多元文化主义始终无法摆脱“分”与“异”的核心概念,不仅未能有效促进民族国家一体化的现实进程,反而致使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家认同理念日渐淡漠和消逝。正是为了深刻揭示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规律,妥善解决现代性所带来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宣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

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既是追溯民族与国家协同发展的内在渊源,又是民族国家迈入现代化的必然因素,民族历史的赓续印证了繁杂多变的民族关系,也为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清晰可见的未来走向。“华夏者国之心腹,边陲者国之支体。若心腹克盈,则支体无害。”依据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历程来看,中华民族的融合一体进程实质上就是汉族与周边民族边界的民族群体的文化共享、文化共融的交流过程,也是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消除摩擦隔阂,走向共同发展的国家统一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中华民族融合一体的现实图景也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解决现代性困境的鲜明范例。“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①传统民族对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是一项长期且模糊的艰巨历程,伴随着国家政权的现代性影响,新时代包容性制度体系下的民族成员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立促使中华民族成了文化多元且根基牢固的民族共同体,打破了不同民族之间因地域、历史、血缘等差异性文化所造成的封闭隔阂,超越了民族历史发展脉络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实现了多民族群体由“历史主体”向“国民主体”的现代转变:民族与国家和谐稳定,民族与国家长期发展,民族与国家紧密结合。

由此看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出发,立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高度,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范本为依托,基于现代全球化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本国与世界,才能以高瞻远瞩的长远眼光和极具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推动世界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进程。为了缓解世界民族国家的民族矛盾与认同危机,从历史记忆唤醒、文化认同强化、民族交往共融、价值自觉引领等维度内在强化民族国家建构坚实的国家认同,从情感共鸣、利益共享、成果共创、责任共担等四种方向全方位、多层次推进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

(三) 价值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厚积革新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范式

在审视现代性给西方民族国家带来的矛盾冲突中,民族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成了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发展的桎梏瓶颈,在文化多元的现代背景下,建构出共同的社会文化对民族国家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共同文化的建构有利于促进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的生成,但同时也会对族群文化造成文化冲击和侵蚀,共同文化始终是以在民族国家内部占据优势地位的主流族群来构建,并通过不同族群进行文化融合、同化的形式最终形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中,共同文化的建构势必会遭到少数族群的抵制和反对。文化的共性能有效促进多民族的文化交往与经济合作,而文化的差异却会致使分裂主义的产生。由此看来,共同的社会文化也始终无法调和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矛盾由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族群文化自身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所引起,普遍存在于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内部。由此看来,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层面的差异,尤其是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正是为了厚积革新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范式,缓解现代性所带来的民族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印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

^①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中国式现代化理念背景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制度性缺陷，不再是建立在剥削、弱化民族群体的基础之上，而是根据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趋势所作出的科学合理的民族治理方略，旨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引导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更有效精准的改善现代性给民族国家建构带来的困境危机，实现多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存共荣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观念具象，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入手修正和完善民族成员对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文化脉络的价值认同，继承和发展以身份自觉为导向的“合”与“一”的民族融合话语，审视和超越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建构体系中强调“分”与“异”的民族排异概念。

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路径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政治文明为统领，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体系中，在审视和鉴别民族差异基础之上建立普适性制度和制定差别化对待民族区域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开放包容式制度保证了民族国家的内在一致性和整体同构性。不仅如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物质文明为基石，通过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民族国家内部多种族间的持续发展创造丰厚物质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精神文明为内涵，以承载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元话语内蕴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与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建构互补关系，以身份认同的文化共融促进和加固世界性“同心圆”，产生取长补短、内外联动的联结效应。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社会文明为目的，积极推动现代民族国家转换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保障多民族群体的公民权益。以生态文明为保障，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描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同民族友好往来的繁荣盛景。

由此观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贯通了“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治”的认同概念，是一项从顶层设计到底层探索、从区域到世界的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综合性系统工程。人类文明新形态完成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推进强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逻辑架构日渐成熟稳定，“五大文明”之间系统整合、有机协调，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体系。从价值维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秉承“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②的原则，拒斥文化灌输和文化霸权。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给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化解文化冲突指明了路径方向。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给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文化和谐提供了现实方案。

四、结 语

习近平指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③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形态都是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功利性关系中及其矛盾的推动下形成和演变的。超越功利性文明形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24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

态将物质文明提升为精神文明为建构目标的文明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才呼唤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当一种文明形态不再使民族国家内部族群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不再使民族国家外部民族之间产生利益侵略的时候,这一文明形态便具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现代性启示就是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权衡把握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发展趋向,科学看待民族视角与国家层面认同理念的辩证逻辑,协同推进现代民族国家“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形态演变,重视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合理满足不同族群的利益诉求,最终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以促进族群融合与文化共荣来实现民族一体化目标。

Abstract Nation-state is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basic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The modernity dilemma of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debated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With the weakening of the originality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political nature, the modernity trend of the nation-state theory has promoted the awakening of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ethnic identity.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urgent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nation-states.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ethnic identity needs to be effectively transformed into national ident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ordinat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modernity trait of Western nation-states reveals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not only reali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transcendence of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form of modern Western nation-states, but also critically reflects on modern Western theory on nation-stat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cognition, path and value, thus opening a new space for eliminating antagonism and conflict of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within a nation-state, and providing a historical inspiration for reconciling the tension between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As a result, it will provide a new paradigm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 new way to address problems relating global governance.

(崔延强,教授,西南大学;张子扬,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715)

[责任编辑:邓颖洁]